

社会变迁与道德教育的文化意义

——“守成”是根本道德

毕世响

(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 福建福州市, 350007)

[摘要] 中国社会当下发生着质的变化,在这场变化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群与人群之间的关系、区域与区域之间的关系,中国社会结构,中国文化,中国社会性质,都在另外一个起点上向原始回归。后现代意识和前现代生活方式,既矛盾又生动地扭结在时代精神之中,教育进化为这个时代的一种生活方式,教育也是生存方式、存在方式、思维方式。当代教育的最大特征是把人从固定的生活方式推向了流动乃至漂泊的生活方式,农耕生活方式下的一切以固定为特征的生活习俗也发生着变化,现在的教育要开辟另外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新式采集、新式渔猎、新式游牧、新式农耕生活方式。采集、渔猎、游牧和农耕生几种活方式,它们在人类历史上先后存在过,当代,通过教育,居然可以同时经验这几种不同时代的生活方式,也只有通过教育,才有可能经验这几种不同时代的生活方式。然而,这个变化在本质上反而强化着中国社会的农耕性质,只是这个农耕性质是现代科学技术下的农耕,姑且称之为“后农耕时代”。这个变化证明着人的不变性,说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根本上是伦理关系,社会的本质是道德与文化。因为我们并没有创造出新的道德来,我们也没有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创造出新的思维方式,我们还是吃着老祖宗几千年前赏给我们的饭,绝大多数人如农民的生活手段还是体力,知识分子还是依靠几千年前知识分子原始的吃饭伎俩吃饭,知识分子是比农民还要有几分市侩的小农人格,因为他们固守着自己的利益与社会角色。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我们没有创造出新的道德体系。

[关键词] 社会变迁; 道德教育; 生活方式; 农耕性质; 后农耕时代

一、后采集、后渔猎、后游牧、后农耕时代

中国社会时下发生着质的变化,其意义不亚于新国家的成立,因为几千年来的农耕生活方式在这个时代经历着巨大的折磨。农耕生活方式的最大特征是定居和土著,以土地为生活之根本,以体力为生活之手段,固定地居住、生存在一个地方。中国人向土地讨生活的方式是种植土地,收获土地,居住土地,固定土地,占有土地,保护土地,土地就是生命,死掉也要埋到土地里,和土地形成一体。土地是一切,有了土地,就有了身份,有了地位,有了尊严,有了人格,有了教养,读书不读书都是无关紧要的事情,读书也不过是为了占有土地罢了。多少大财主皆目不识丁,也不关心子女的读书事务。或者把读书仅当作一个消遣,一种风雅罢了,为生活所不必须。高官显贵首先置办土地,以为自己将来归去来打算。即使位极人臣的高官,晚年也告老还乡,不肯把自己的一把老骨头埋在异乡,而是追随先人于地下,那也就占有了一片土地,使后人有所皈依,后人就守着祖先的一抔土过日子。中国的教育精神,是出不了“守成”两个字的,大到天下国家,小到家室个人,莫不是守着“守成”的古训。

社会变迁的实质是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化,并不是人本质的变化,人是不变的。生活的具体内容如吃穿住行、生老病死也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吃穿住行、生老病

死的形式而已。在农耕生活方式下，人靠土地过着定居的土著生活，而在原始社会，人靠采集、渔猎、游牧，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这个“漂泊”，不是穷极无聊，不得不游荡找衣食的意思，而是游动着过日子的意思，就像渔民在水上捕鱼一样，本来就不是固定在一点的。当下社会的生活方式正在由土著定居向漂泊不定转化，这个时代兼具采集、渔猎、游牧诸时代的特征和意义，不妨把这个时代称为“后采集、后渔猎、后游牧时代”；而采集、渔猎、游牧时代，具有原始社会的意义，今天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性质有向原始回归的意思，且不妨把这个时代称为“后原始社会”或“后原始时代”；中国社会具有浓重的农耕社会性质，农村和农民是中国社会的主体成分。我们现在的一切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还都是农业生活方式，我们没有在农耕生活方式之外创造出多少新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和思维方式，我们的文化精神还是农耕文化精神，故而还不妨把这个时代称为“后农耕时代”。

人是一个承载物，他承载着他的生活方式，他的意义也就在生活方式之中绽放出来，教育无非就是示现人这样的意义。

“安居乐业”是中国人对生活的根本追求，安居，有固定的居所，乐业，有稳定的为生之业，以“稳定”为生存目标；然而，安居乐业并不是人类生活的源头意义，人类生活的本意似乎是漂泊，无论世俗的生活还是神圣的生活，皆以漂泊为文化特。老子最后不知所终，孔子一生席不暇暖，苏格拉底有家就像没有家一样，释迦牟尼把出家当作求得解放的修行法门，耶稣带领门徒四处游荡、教化，穆罕默德夜里带领门徒出麦加城。宗教家最大的世俗特征是以无家为家。那么，中国几千年以来追求安居乐业，现在又向漂泊回归，就是向人类生活方式的源头回归。教育相应具有了复杂的意义，教育要教人背井离乡，背井离乡不是过去的消极、无奈意义，是积极意义。安居乐业具有了一定的消极意义，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固定地生活几十年，反而是一种无奈，甚至是一种无能呢。

《易经》是农耕生活方式的文化集成，《易经》是一个循环智慧，人类的生活就是循环，从起点转圈子，然后再回到终点，也就是原来的起点，是谓圆融。《易经·系辞》曰：“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乐而玩者，爻之辞也。”“安土敦乎仁，故能爱。”一般认为从大禹治水以后中国走向了农耕社会，从那以后中国人特别看重“安土重迁”，迫不得已不会迁徙，把迁徙看作不幸，至少是无奈。“守成”成为中国生活的核心精神，从政治上的守先王之法到生活上的守先人之业，孔夫子说“三年无改于父道谓之孝”，都是广义的“定居”思想。客死他乡和女子远嫁都是人生的悲哀，当下，接受了教育，离开家乡在他乡荣耀的人，一律都最后光荣地“客死他乡”；而女子若能够远嫁到海外，却是莫大的荣幸，真是祖上有德——这是现代“和番”。所以，“客死他乡和女子远嫁”这些过去视为悲哀的生活教育思想，在今天的教育思想里面都要否定了，来了一个哲学上的否定之否定。

人类早期以采集、渔猎为生，后来形成了游牧生活方式，采集、渔猎、游牧都是以部落为团居，是原始意义的“逐水草漂泊”的生活方式。尽管不像卢梭所说的居住在森林里面的“野蛮人”或者“孤独人”，然而他说的是关于人的一个生动理念。这个时段相当长，比现在的定居生活方式不知道要长多少时间，是人类历史的史前史。我们对史前史模糊得狠，而我们对三皇五帝以后的历史也并不比三皇五帝以前的历史更清楚；三皇五帝属于史前人物，现在的人更倾向认为他们是部落首领，不是后来意义上的皇与帝。到了三皇五帝时代，出现了农耕生活方式，三皇五帝的真正意义正在此——使华夏民族的生活方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空，人类的文化涵义从此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们教会先民稼穡，是民众的导师，历代崇敬他们更是把他们当作老师崇拜的，他们身上更是师道精神。《易经》实际上就是三皇五帝的掌故，和生活，是他们的生活叙事。

即使在三皇五帝时代，先民的生活还是保留着浓重的漂泊痕迹，“彭祖”如夏、商初叶，各个王朝首都频频迁徙，可知其游牧根性之未除；只有到了商朝中叶，历史上有名的盘庚迁

都殷墟以后才不再迁徙，人民的生活方式一转而为土著的农耕生活，以享安定的生活；周统一全国后，农业经济逐渐发展起来，手工业和商业也开始兴起，各个诸侯国在国都和新兴的城邑正式筑城，许多城市就是那个时候流传下来的，如斯时江苏徐州已具有城市国家之规模。周所奠基的文化是农业文化，孔子祖述周礼，儒学（儒教）是农业文化精神，那种教育精神一直因循到现在。

所以，我们对待历史还得有生活方式的解读。三皇五帝、周公、孔子是人类生活方式的历史导师，是人类的大教育事件，他们开辟了一个新的生活方式——定居的农耕生活。今天的教育就是教人怎么生活，教育，又回归到它原始的意义上了：生活。这个生活是全人类的生活，不是哪一个阶层（阶级）的生活。所以，在生活面前，真正是人人平等，从而引申出教育促进人类平等的意义，民主的意义。同样，这个意义是生活意义，不是其它什么意义。把教育理解为一种生活方式、生存方式、存在方式、思维方式，现在的教育要开辟另外一个新的生活方式——新式采集、新式渔猎、新式游牧、新式农耕生活方式。

当代教育的最大特征是把人从固定推向了流动，农业生活方式下的一切以固定为特征的生活习俗都在今天发生着变化，如婚姻的多元化、性关系的随意性、亲子关系的松弛、家庭、人与人关系的个人化、道德的随意性、意识形态的淡泊、文化的原始化等等。这些都成为教育精神的具体涵义，接受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与这些特征同化，同时把自己身上或者周围还残留的一些具有农耕生活方式的东西异化掉。今天的审美标准往往是以丑为美、以怪异为新、以宣扬个人生活琐事为荣。这里所谓的“丑”、“怪异”、“个人生活琐事”等都是定居土著生活方式下的观念，如果换一种思维方式的话，那的确是美的、新的、荣光的，正如原始部落的文身、穿戴打扮一样，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之中，是最具有文化意义的。

实际上，我们的先民就是那样的文化，《礼记·王制》曰：“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今日生活之中，被发文身、被发衣皮、雕题交趾、衣羽毛穴居，不火食、不粒食，等等，都成为一种时尚，且是先进人士的风雅作为。被发女郎遍地走，文身男子随处见。从外国留学回来的知识分子人士，学得西戎人的风俗，食用油吃得很少，蔬菜洗净放在锅里用水煮开，捞出来加上点盐巴，或许还撒点胡椒面，一家两、三口人，一个月连一斤油都吃不了。这也是西戎先进文化教育的结果之一；我们在大饭店的餐桌上，常常享受到廉价的“不火食”、“不粒食”的昂贵肴馔，当然也会把这些先进餐桌文化带进自己的厨房；这些年木屐又在青年人之中流行了起来，成为时髦和“前卫”，时人多以为那是东洋先进文化，岂不知这是我们祖宗几千年前的剩余把戏。“据潘光旦、费孝通两位先生的研究，东方沿海一带的居民是夷人，夏族东侵，曾将他们挤压出去：一支北上，迁向朝鲜半岛，也有可能到了日本；一支南下，迁向东南沿海和两广之地，也有可能跨出国界。从孔子到唐、宋时候，东部居民，多穿木屐，淝水之战时，谢安听到打胜仗的消息，急切之中，倒穿了木屐跑出门去，有人说是一种‘木屐文化’，今天已不见了，日本人却至今还在穿木屐，两广一带，自然穿得更多一些（费孝通：《从事社会学五十年》，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版，第88—91页）。”^①木屐确实是道道地地的“东夷”文化，不过，此“东夷”乃我中华之东夷（今天江苏徐州一带），非海外之岛国“东洋”扶桑也。

我们今天住的高楼大厦，莫不是钢筋水泥浇铸的洞穴，这和以前住在窑洞、茅草房、土坯房里的精神是不一样的；然而，当下生活之中的这些花色品种，都会使我们联想到处于茹毛饮血时代的先民生活精神，我们实在是重复祖先几千年前的生活方式而已，或者说，我们的生活方式又回到了几千年前。人类的生活方式就是人类的精神外衣，甚至就是精神本身，而不必去人以外去寻找人的精神。只有把人的一切生活细节连缀起来，才能知道人。因为，

^① 根据梁白泉：《徐州民俗的历史渊源及地区特色——为〈徐州民俗志〉序》，《徐州史志》，1992年第3期。

人只是一个名义，只有通过人的生活方式才能示现人，所以，生活方式就是人的精神。这些风俗都成为这个时代的教育精神内容，铸造着这一代人的身心。

今天的教育具有多重意义，它将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所有生活方式综合了起来，通过教育将过那样的生活，也只有教育才能使我们在形式上重复祖先的生活方式。采集、渔猎、游牧、农耕是四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尽管它们先后在同一时代并存过，教育居然能够如此这般地跨越时代，综合时代，也说明时间是一个错觉与幻觉，历史是没有前后的，人类也没有昨天今天明天。历史就像一瓶水，可以人为地分几层，如上层、中层、下层，只要瓶子一晃动，就没有了原来的层次。

中国社会天生是一个农耕社会，因为中国的地理和气候特征具有典型的一年四季，二十四节气过去、现在和未来仍然是中国社会生活的典章制度。中华民族的性格就是二十四节气性格——圆融的、起点就是终点、终点就是起点、不雕饰的自然性格。人就是自然。

二、两种生活单元：农村部落和城市部落

在社会由土著定居向漂泊生活方式转化下，中国农村和城市作为社会形态，它们的原始部落的形式和精神益发凸显了。

中国具有两种生活单元，农村和城市，这两种单元无疑都具有原始部落的风范。农村在表面上看起来更像原始部落，城市则在精神上更是原始部落。农村部落形成后来的圩寨，往往有兵局子驻守，就像《水浒》里面的祝家庄和曾头市，既防强人入寇，又入寇其他部落。这样的圩子在清末民初随处可见，现在一些以“圩”、“堡”、“寨”等为名的村镇，往往当年就是当地的祝家庄和曾头市。那是他们往日的辉煌，现在再也没有祝家庄和曾头市那样的强梁村镇，那样的圩子（部落）具有原始国家的意思；而城市则具有原始城市国家的意义，原始城市国家是由若干个部落构成的国家，城市国家形成后来的城堡或者城池，城池成为中国乃至人类生活的集中地，同时还是部落团居的意思。那就是西安半坡遗址原始部落的放大，这个时候的北京人就是北京人时候的北京人的延续而已。

人类社会是城市和农村一个鼻孔出气的共同体，城市和农村的对立，是人类社会的一大退步，增加了社会的复杂意义。所谓的文明社会，其所有政权都是以城市为基础来控制其领土的，所以，城市又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标志性阶段，是一个特殊的文明象征。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是野蛮象征——阶级的出现，或者人的差异的出现，人的不平等的出现。这个意义今天仍然存在，而且还强化了。中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似乎形成了矛盾，甚至敌对关系。

那么，一切农村和都市在今天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具有部落性质，唯一的不同就是没有酋长，没有道德领袖，道德成为新部落精神。采集、渔猎、游牧三种生活方式，相对应的精神是氏族精神，而农耕生活方式，亦具有浓重的氏族精神味道，同时又具有一定的奴隶精神。我国一般认为，夏代开始向奴隶社会过渡，农耕是奴隶社会的生活方式。最好不要把奴隶精神理解为被人奴役，为人做奴隶，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为自己做奴隶，这样才能把人还原为人，而不是分为奴隶主和奴隶。只有自己把自己解放了，才能获得解脱。这个新的部落精神似乎是以道德为核心的氏族精神，而奴隶精神正好是它字面意义的反面：把自己从自己的奴隶圈套中解脱出来，这就是新时代的自由或者解放的涵义。

三、知识分子部落与教育精神

知识分子是中国当下最典型的采集、渔猎、游牧漂泊部落，他们最信奉哪里水草肥美就往哪里去的生活信条。北京成为知识分子的首选部落。

知识分子比农民实惠而狡猾，比市民计较而市侩。他和她知道，一个人一旦在北京出了名，那么，他和她就在全国出了名，也许他和她并没有太高的水平，这也是知识分子拼命往

京城挤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高考分数线的划定，北京占有中国除台湾、香港、澳门以外最好的教育资源和其它资源（气候除外），而北京的高考分数线却几乎是最低的，拥有北京户口，就拥有高考优势，仅具有北京户口的人，就比外省人高一等；上海也具有同样的猫腻；在别的省份上不了大学的分数线，具有北京、上海户口的人儿就能够上很不错的大学。中年知识分子如果没有到外国部落渔猎的能耐或者智慧，往往也就找个一可以养老、二可以为儿女上学有便利的部落，了却残生。这还是典型的农耕生活方式，农民思维——养老和为儿女打算，也就是为儿女积攒几石粮食、几亩地、几间房，将来可以婚嫁过日子。同时，也是为自己找好坟地、买好棺材罢了，知识分子最信奉何处黄土不埋人的古训。所以，当下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是采集、渔猎、游牧生活方式和农耕生活方式的结合，是采集、渔猎、游牧生活方式之中贯穿着农业生活方式的精神。即，知识分子过的是采集、渔猎、游牧生活形式，守着农业生活精神，他们在流动之中体现不动精神，这就是知识分子的教育精神。知识分子更是典型意义上的农夫，而且是小农人格，很放不开，局限在一个小部落，为了个人利益有几分蝇营狗苟的悲哀，实在小家子气，没有为广大众众着想的情怀，在他们身上形成了可怕的偏见与傲慢；农民过着固定、土著的农业生活方式，却追求采集、渔猎和游牧生活精神，他们是在不动之中体现流动精神。中国农民是一个一言难尽的阶层或者阶级，而工人则介于二者之间，更多的是不动，在精神上，工人落后了。

知识分子又像走江湖的，跑码头的。即使坐在一个地方不动的人（有自己的码头动不了？或者有自己的码头不愿意动？年事已高，动不得，没人要，等待大行之日？或者几者兼而有之），也是把自己的观点当作手中的把戏在各种各样的码头上戏耍，精神还是处于漂泊之中。总之，生活精神以漂泊为特征，这个漂泊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辛酸、艰苦，虽然也具有几分那样的意义，更多的是一种刻意追求。

知识分子的舞台比以前变得狭小了，集中在大中城市，小城市没有形成知识分子群体的气候。至于县城，在知识分子的眼睛里，还是农村的概念——知识分子别的不懂，最懂得概念。这不由得使人想起解放前，农村在文化上很兴旺，一个小镇就是一个了不得的文化部落。而知识分子在乡村里集中在学校里面，那时郎中很少，乡村的文化力量和道德表率就是乡绅和教书先生两大行。有时乡绅和先生集于一身，更多的是，乡绅往往代表地方上的传统道德文化，有比较殷实的家底子，而纯知识分子是代表新旧文化的人物，或者道德代言人，他们本身也许过着比较清贫的生活。然而，老年人现在还常常说起，那时只要一个先生（教书先生）走过来，不管老人还是小孩都会自觉地站起来，称呼一声“先生”，向先生致敬；现在有一个先生走过来，确实还没有人给你脸上吐唾沫，子曰行的德性和智慧还没有沦丧到那个程度。你只管走你的路，不要担心会有人称呼你先生而耽误了你走路。即使你刚刚给上过课的学生也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学生，正是两不惊扰。因为你是教书，不是教人，他是上课，不是上人。教师和学生都最具有哲学精神——达到了无人的虚空境界，从另外一个方向实践着佛教的意思。这些在今天的大学校园里往往有预料中的功效：学校里恰恰没有教育精神。但是，有一点却是无疑的，那就是，知识分子已经不足以成为道德表率或者道德权威了，他们的身份更多的具有个人生活意义，所以，他们的精神和贩夫走卒在道德和智慧上是平起平坐的。的确，这是一个萌发民主意义的时代，因为人与人之间只有社会地位和经济上的差别，没有德性和智慧的差别，因为这个时代的精神是世俗生活精神，人走向了世俗，这从反面要求教育具有神圣精神，要追求神圣。

中国今天形成了知识分子的几个大部落群：北京、上海、广州、东南沿海省份和城市，如江苏省、浙江省、广东等省份，青岛、大连、厦门、南京、杭州、深圳等都市，都是人财两旺的部落。知识分子相信那些地方是大池子，里面的鱼虾既大且多，水草肥美，牛羊遍地走。实际上，每一个城市都是一个部落，处于西北的西安、兰州，处于西南的成都、重庆、昆明、桂林等，处于东北的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处于北方的各个省会城市，也不是不吸

引知识分子。然而，那些地方水草毕竟不如前面那些部落肥美；大学是知识分子聚集的部落，现在一个大学一般都有几千个知识分子，和一两万个准知识分子。这几万知识分子聚集在一起，是以教师和其他文化人的身份影占身体。他们虽然站在地上，而他们的灵魂却飘在天上，无所皈依。

知识分子现在最大的问题可能有四个，一是酋长，二是共同体，三是家庭，四是贵族精神。

古代部落如徐夷、淮夷形成共同体，又与淮河流域、泗水流域部落形成共同体。这些共同体向四周迁徙、辐射，他们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原来的部落地域。据潘光旦、费孝通两位先生的研究，春秋战国时东夷人中靠西南的一支族名叫“徐”的部族（就是现在江苏省徐州市一带，为古大彭氏国，史载黄帝六世孙彭铿曾为长，彭铿就是孔子称的“老彭”，也就是传说中寿高 800 的那个人），生活在淮河和黄河之间，至今留下“徐州”这个地名。瑶、畚、苗这三个民族，和徐夷关系最为密切，他们早年从淮水流域向南迁移，过长江流域进入南岭山脉。他们的传说、歌谣如瑶族《过山榜》、祭祀神祇风俗与汉族传说以及典籍记载，甚为一致；解放后徐州地方的考古发掘如花厅遗址、丘湾遗址也印证着潘、费二先生的研究。

①

今天，东南沿海已经成为国家的一个核心，岂不知当年是蛮夷之地，江南的繁盛是更晚的事情。中国的文化政治中心一直在江北，三国魏晋南北朝以后，逐渐南移，实际上，南宋以后，才形成中国社会的另外一个南北格局，那个格局一直延续了下来。所以，尽管宋朝版图最小，南宋偏安一隅，却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变化标志。明朝定都北京是中国发展的一个里程碑意义，中国以前的国都都围绕着陕西、河南、江苏、浙江，在黄河和淮河、钱塘江流域。民族迁徙是形成大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华民族是当年居于中原的部落和居于四夷的部落融合的结果。最典型的意义是黄帝、炎帝、蚩尤部落之间的冲突到最后的融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社会的南北差异并没有多么大。改革开放后，南北差异加剧了，如果没有北方的北京作为国都的话，中国的格局会发生剧烈的变化，甚至会发生社会的动荡，首都的意义超出了城市的意义，而是国家、民族和社会的意义。当然，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问题还有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中国社会的根，实际上还在北方，而不在南方。社会的根是社会的人文，社会的文化，社会的积淀，社会的基础。现在的南方更是一个流动经济的意义，不是一个固定的意义。

这些年，中国社会有一个极其有意义的变化，那就是北方人的南方化，和南方人的北方化，即北方人的个性越来越南方人化，而南方人的个性越来越北方人化。这是国民社会性格的一个新气象，这种国民社会个性的变化可能会成为影响中国社会的最重要文化，这样的文化特征自然进入我们的教育体系之中。教育就是一种文化迁徙，把一地文化迁徙到另外一地，如孔子的弟子把孔子学说思想从鲁国带到各地。顺便说一句，孔子学说能够传到江南，他的学生言偃（即子游，前 506—？）首居其功，因为他是唯一的吴人，使蛮荒的江南也能被弦歌之教化了。

中国文化分为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北方文化是指孔子、孟子的儒家文化，南方文化是指老子、庄子的道家文化；孔子是鲁国人（山东曲阜），孟子是邹国人（山东邹县），属于鲁文化圈；老聃（子）河南苦人（今鹿邑）；庄子蒙人（河南商丘，或说山东蒙阴人），属于楚文化圈。一般来说，儒家文化温柔敦厚，道家文化飘逸灵动。

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中国南方和北方的体认是不准确的。我们现在认为南方文雅温和，北方剽悍豪放。然而，这正相反。历史上北方文化如孔子是儒雅、经世致用的风格，温柔敦

① 根据梁白泉：《徐州民俗的历史渊源及地区特色——为〈徐州民俗志〉序》，《徐州史志》，1992年第3期。

厚；而南方文化却是威武剽悍，如专诸刺王、越王勾践、吴王夫差一类故事。

文化的融合就是人种的融合，人种的融合就是文化的融合，这个道理知识分子当然懂得。然而，时下的知识分子之间并没有形成部落之间融合的趋势，只有学术上的交流。而这个交流往往具有不对等的意思在里面，因为部落之间本身就具有不对等的意思，如北京部落和上海部落，在地望上就有高人一等的意思。那些居于中、小城市和边远城市的知识分子，同时又处于三流学院，就很难溶入北京知识分子部落或者上海知识分子部落。既然知识分子没有融合的意思，那也就不会有公认的酋长。这又容易使我们想起民国时期和毛泽东时代知识分子下边疆、下农村的意义。从而引出一个根本的问题：知识分子的舞台在什么地方？知识分子应该和什么人打成一片？知识分子的酋长是什么样的人？

知识分子之间并不是没有形成某种意义的合体，如专业合体、地域合体、师承合体，然而，这些合体更多的是一种既带有自然亲合因素、又带有自然排斥（排外）因素的共同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在知识分子身上还是非常起作用的。

尽管中国社会生活方式由土著定居向漂泊转化，漂泊实际上是有其自身的机制的。譬如，游牧是漂泊生活方式，而游牧有其自身的道理。以草原为例，现在的草原可能才是真正经历历史上最残酷的时期，以后还有没有草原？有没有畜牧业？如果按照今天这种趋势走下去的话，可以绝对肯定地说，以后就没有了草原，没有了畜牧业。因为现在的草原以“定居”方式放牧，把草原划分成若干块地，像农民的责任田一样，一家一户放牧。实际上，这已经是农业方式，而非畜牧业方式，这也就从根本上摧毁着草原和畜牧业，尤其也就不再存在“游牧”。“保持移动游牧的生产方式的根本条件是共同所有和共同使用牧场。游牧业与养畜业的本质区别决定了游牧改革的走向。如果照搬产生于19世纪末期的适合于养畜业的饲养方法来推进牧业现代化，草原将会被破坏，不利于草原的可持续利用，从而影响畜牧业的发展。”“当前，研究蒙古高原游牧民族历史的学者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就是游牧走向何方。因为目前的事态使人们不由自主地产生忧虑：游牧会不会成为历史。被称为蒙古族历史与文化根基的，拥有三千多年历史的蒙古高原的生产方式——游牧，正如风中摇曳的烛火处于奄奄一息的窘态。“游牧，亦作移动式牧业，是牧业的一种形式。蒙古高原，欧亚内陆草原游牧人的先祖们在几千年的移动放牧经验中，掌握了移动放牧、轮换利用牧场这一最佳方法，确立了游牧形态。毫无疑问，要与草原生态环境保持平衡，非游牧不可。游牧民尽管一年四季反复利用草场，也不会导致其状况恶化，每年都能使牧场恢复到良好的状态并可续用。但是，这个平衡一旦失调，牧场定会恶化，牧业就会受挫。”^①

可能我们在许多思维上，都和草原游牧变化的情形一样，这是摧毁社会基础的勾当。社会当然得有所摧毁，摧毁以后得有创新——得有比被摧毁的形态更完善的创新。如果没有比被摧毁的形态更完善的创新，最好保持原来的形态。时下可能我们有能力摧毁，并不必然有能力创新。因为这需要大智慧，而这样的智慧不是一般的教育所能够胜任的，而是社会大课题，人类大课题。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Social Flux and Moral Education

-----Conservation is the Basic Morality

^① [日]吉田顺一(著)，阿拉腾嘎日嘎(译)，《游牧及其改革》，《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Bi Shixiang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China is experiencing the tremendous transformation in the aspects of social relations; Chinese culture has gone back in the certain degree. Post-modern ideas and pre-modern life styles coexist in this time. Education becomes the way of thinking and the style of existence. The character of modern education presents in the form of fluxion and change, which pioneer the new life style. Education provides us the opportunities to the different life styles in the different times. The “post-cultivation” times has proved the invariability of the human nature. The found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is the ethical connection in the form of the morality and the culture. We regale on the heritages of the ancestors. The intellectual keep to the profits and social roles with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Babbitt. We fail to innovate the new system of moral values.

Key words: social flux; moral education; life style; cultivation character; post-cultivation times

作者简介: 毕世响，男，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道德教育。